

比较

2017年
第5辑
总第92辑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理查德·达舍 原田信行 星岳雄 柿田健儿 冈崎哲二
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

罗伯特·希勒
叙事经济学

路易吉·津加莱斯
企业的政治理论

许成钢
新制度经济学的过去和未来

丽贝卡·查韦斯 约翰·费雷 约翰 巴里·温加斯特
美国和阿根廷司法独立的比较

帕特里克·博尔顿 黄海洲
国家资本结构

田 静
美国两次股灾的启示

薛暮桥
回忆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创建十年

尼古拉斯·霍普
中国的改革奇迹仍待继续

比较

总第92辑

COMPARATIVE STUDIES

2017年第5辑

吴敬琏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第92辑 / 吴敬琏编.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086-8180-1

I. ①比… II. ①吴… III. ①比较经济学 IV.

①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2725 号

比较·第九十二辑

主 编：吴敬琏

策 划 者：《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者：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承 印 者：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86-8180-1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400-696-0110

<http://www.caixin.com>

010-58103380

E-mail: service@caixin.com

卷首语

经历了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二，业已有七个年头，但是，经济体制从适应追赶型增长，转变为支持创新型经济增长，才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虽然创新驱动增长看似成为共识，然而，创新如何产生，又如何驱动增长，依然需要我们去学习与借鉴，毕竟大多数国家没有能够跨越门槛，从模仿、追赶转变为创新型经济增长。因此，回溯自熊彼特以来学者对此进行的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所提供的丰富历史故事和现实案例，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创新产生和创新驱动增长的机制。20 多年前，《比较》的编委就开始关注创新，并向国内引介相关文献以及硅谷等成功创新经济体的经验。本辑《比较》将延续这一传统，为读者提供经济学家关于创新驱动增长的研究和洞见。

开篇星岳雄等人的文章，以日本的创新型经济增长为对象，研究了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创新经济体——硅谷。他们将硅谷视为一个创新生态系统，从中概括出了创新型经济增长的六大制度基础：为承担过高风险的创业企业提供资金的金融体系；能够提供高质量、多样化和可流动的人力资源的劳动力市场；旨在持续不断地产生创意、产品和企业的产业—大学—政府之间的互动；老牌大企业与小型创业企业共生共荣的产业组织；鼓励创业的社会制度；协助企业创立和成长的各种专业组织。作者指出，为了促进创新型经济增长，日本政府制定并实施了诸多政策措施。但问题在于，很多政策在没有严格政策评估的情况下就开始实施，因此并不清楚哪些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创新型经济增长所需的制度基础的建立和完善。由此，作者认为，对日本来说，尤为重要的建立健全用于政策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对所有政策措施进行严格评估。这一点对中国的政策制定来说也具有重要的警戒意义。

希勒的《叙事经济学》一文是他在 2017 年 1 月 7 日美国经济学会第 129 届年会上的主席演讲。在这篇文章中，他阐述了经济学研究应当注重的一个新领域：在解释经济现象时，深入研究人们对这些现象的叙述，也即叙事或故事。人天生喜欢交流，人类大脑总是积极响应叙事，并以此来论证即将采取的行为的合理性，甚至连支出和投资这样的行为也不例外。叙事会流传，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就像病毒一样扩散，并产生经济影响。希勒用传染病学中的克马克—麦肯德里克模型分析了叙事的病毒式扩散机制。在他看来，一些重大的经济事件，如 1920—1921 年美国的经济衰退、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2007—2009 年的大衰退以及美国当前的政经形势，都与它们各自的流行叙事密切相关。尽管研究人类叙事的独特现象并非易事，但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叙事经济学的研究仍具有空间。经济学家可以利用数据库，做定量分析，还可以与人文学科的专家合作，理解叙事的结构，在此基础上将叙事纳入经济学分析，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波动。

路易吉·津加莱斯的文章以当代全球巨无霸公司的市场权力 (market power) 为着眼点，构建了企业的政治理论框架。他突破经济学将企业视为“合约的联结”这一传统视角，分析政治权力与市场权力如何相互作用，阻碍竞争，抑制创新，形成“美第奇恶性循环”，进而威胁自由市场经济的运行及其繁荣。“美第奇恶性循环”的可能性和程度取决于六个主要的非市场因素：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媒体市场的状况、检察和司法权力的独立性、竞选融资法律，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应当从这六个因素着手，必须警惕“美第奇恶性循环”且化解其风险，才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希望。

许成钢的文章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他认为自亚当·斯密以来，经历了从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到“固定住”制度的新古典经济学，再到新制度经济学兴起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制度的度量始终是一个重大问题，即使新制度经济学为讨论制度开发出了新的概念和分析工具，在度量制度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对法治、民主、产权等的度量依然面临很多困难。这既是制度经济学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也是制度研究者们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大机遇，而当前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提供了度量制度所需的技术手段。不过，许成钢也强调，真正的突破除了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创造性和发现重大问题的直觉，而这有赖于宽广的视野，从而在把握和理解整体趋的基础上抓住重点细节，与此同时还必须保持思想的开放，做到思考无禁区。

在“法和经济学”栏目中，巴里·温加斯特等人探讨了司法独立体制的制度条件。司法独立程度不仅取决于终身任期制等书面保证，还受到民选政

府的权力结构的深刻影响；民选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如果联合行动，可以用很多制度或非制度措施来打压“既没有钱袋，也没有刀剑”的司法机构。作者将政府分为两种类型：民选官员内部有相对统一意志的统权政府 (unified government)，以及官员内部存在显著而持续争执的分治政府 (divided government)，并建立了一个空间博弈模型对两种政府下的法院独立程度进行分析。他们还借助该模型考察了美国和阿根廷独立司法的历史演变，以最高法院法官为代表的司法机构在复杂政治背景下的妥协和抗争，深刻地影响了两国的历史。理论和案例分析都表明，分治政府下的权力分散化相比于统权政府更可能给独立司法机构提供舞台。

帕特里克·博尔顿和黄海洲的文章是对其最新研究论文的概述。文章应用公司金融理论来分析国家的资本结构，并为货币经济学、财政理论和国际金融学提供一个新的统一的微观理论基础。具体来说，一国发行的主权货币和以本币发行的主权债是国家资本结构中的股票，以外币发行的主权债是债务，通货膨胀成本源于多发货币（股票）后在国民之间的财富转移（股权稀释）。在国家层面，其货币（股票）发行得越多，面临的破产风险就越小；其货币（股票）越被国际资本市场高估，越应该发行更多的货币（股票），以加大投资、消费或换取外汇储备。欧元区国家在1999年初使用欧元，相当于同时重置资产负债表，实行股转债，将大量的股权（本币主权债）变成等额债权（欧元主权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可以有较大的外汇储备，如发达国家瑞士的外汇储备超过其GDP规模。将中国的国家层面股权、债权情况与美国、日本、英国对比可知，外债较少而股权较高是这四个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共同特点。这一理论也为判断当前热议的“央行货币超发”提供了新的视角。

近来，金融科技 (Fintech) 迅猛发展，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然而，金融科技并非是当今的现象，上世纪60年代信息技术就运用到了银行后台业务，50年前，世界上第一个用于证券交易的电子通信网络就已诞生，并逐渐发展成为目前欧美市场最重要的场外交易场所。80年代，自动订单撮合系统逐渐兴起，并成为证券和期货交易所的主要交易平台。田静的文章详细描述了美国时隔20年分别在不同交易技术环境下的两次股灾过程，分析了新技术环境下，信息不对称和人的非理性行为如何导致市场失灵，引发金融市场动荡。本文的分析表明，金融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提高金融信息的处理和传播速度，降低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失灵。但是，它无法根治市场失灵，在一定环境下反而可能引发新的市场失灵，业界和监管部门在推动金融科技发展的同时，不应该忽略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

“改革记忆”栏目是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

身——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上的发言。他回顾了十年间，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在财政体制改革、中央银行和金融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以及价格改革等重大决策中提供咨询和建议的经验与教训，以及这些改革取得的成果。他还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为一个研究咨询机构如何开展工作提出了建议，强调需求导向、超脱性或独立性、局部与全局结合，以及研究机构之间的互动。对于当前的政策研究和智库建设来说都是很好的启发。

2017年夏，《比较》编辑室专访了曾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的尼古拉斯·霍普教授，整理成《中国的改革奇迹仍待继续》一文。霍普教授在世行任职时负责过东欧、中亚、印尼和中国等多个地区，对亲眼目睹和参与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整体改革印象极其深刻。他谈到朱镕基在推动全面市场改革时的眼光、意愿和魄力，吴敬琏、钱颖一等经济学家的前瞻性研究成果，以及周小川、楼继伟、韦钰等政策官员的优秀能力与杰出贡献。霍普教授看到，相比于西方式选举产生的“从天而降”的领导人，中国的人事制度的优点是更关注对高级干部的长期系统性培养。当然在未来，草根和中产阶层会更加关心教育、医疗、交通、环境等现实问题，民众的诉求和情绪需要及时回应和疏解。因此，中国特色的体制也会有多元化的进程，应该鼓励开展更公开透明的政策讨论。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主管 中信集团
主办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编 吴敬琏
副主编 肖梦 吴素萍
编辑部主任 孟凡玲
编辑 包敏丹 马媛媛
封面设计 李晓军 / 美编 杨爱华

经营部
总经理 张翔
副总经理 傅继红
华北总经理 董光明

发行总监 周广宇
设计总监 石乐凯
品牌传播部高级总监 马玲

独家代理：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8610) 85905000 传真：(8610) 85905288
广告热线：(8610) 85905088 85905099 传真：(8610) 85905101
电邮：ad@caixin.com
订阅及客服热线：400-696-0110 (8610) 58103380 传真：(8610) 85905190
香港地区订阅热线：(00852) 21726522
订阅电邮：circ@caixin.com 客服电邮：service@caixin.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8号院三里屯SOHO6号楼5层（邮编：100027）

目 录

Contents

第九十二辑

1 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

理查德·达舍 原田信行 星岳雄 栉田健儿 冈崎哲二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for Innovation-Based Economic Growth

by Richard Dasher; Nobuyuki Harada, Takeo Hoshi, Kenji E. Kushida and
Tetsuji Okazaki

前沿

Guide

74 叙事经济学

罗伯特·希勒

Narrative Economics

by Robert J. Shiller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118 企业的政治理论

路易吉·津加莱斯

Towards a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Firm

by Luigi Zingales

特稿

Feature

140 新制度经济学的过去和未来

许成钢

The Past and Future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by Chenggang Xu

比较之窗

Comparative Studies

152 司法独立：美国和阿根廷的比较

丽贝卡·查韦斯 约翰·费雷约翰 巴里·温加斯特

A Theory of the Politically Independent Judiciar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nited States and Argentina

by Rebecca Bill Chávez, John A. Ferejohn and Barry R. Weingast

金融论坛

Financial Forum

182 国家资本结构：理论创新与国际比较

帕特里克·博尔顿 黄海洲

The Capital Structure of Nation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by Patrick Bolton and Haizhou Huang

189 美国两次股灾的启示

田 静

The Implications of America's Two Stock Market Crashes

by Jing Tian

改革记忆

Retrospect of Reform

214 回忆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创建十年

薛暮桥

A Retrospect of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of State Council at Its 10th Anniversary by Muqiao Xue

220 中国的改革奇迹仍待继续——专访尼古拉斯·霍普教授

《比较》编辑室

Interview with Nicholas Hope

b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tudies

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

理查德·达舍 原田信行 星岳雄 株田健儿 冈崎哲二

引言

创新对一个成熟经济体的增长至关重要。日本过去 20 年来经济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体制未能从适应追赶型增长转变为支持创新型经济增长。

本报告研究了创新型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并提出了促进日本创新型增长的政策。在第 1 部分，我们首先指出创新对于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保持增长的重要性。第 2 部分研究了硅谷的商业与经济，在这里我们观察到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创新型经济增长。我们确定了硅谷产业生态系统的 11 个特征。第 3 部分探讨支持这 11 个特征的制度基础。我们认为（A）资金、（B）人力资本、

* Richard Dasher，斯坦福大学中美技术管理中心主任；Nobuyuki Harada，筑波大学研究生院信息工学研究科讲师；Takeo Hoshi，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项目主任；Kenji E. Kushida，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日本研究员；Tetsuji Okazaki，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 本报告是为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准备的。我们感谢 NIRA 的财务支持，以及 Jiro Ushio 和 Reiko Koda 对报告初稿的评论。Hern Hern Chua、Yaqian Fan、Yoshihiro Kaga、Satoshi Koi-buchi、Shingo Nakano、Benjamin Pham 和 Michiru Sawada 帮助我们考察了安倍经济学的各项创新政策。2015 年 3 月 15 日在东京的 NIRA 研讨会上与 Tomohiko Inui、Yasufumi Kanamaru、Takeshi Ni-imami、Hiroshi Suzuki、Ikuo Sugawara、Sakie Fukushima Tachibana 的讨论让我们受益匪浅。Ian Myers 提供了研究协助。我们也感谢 Nao Toyoda 和 Naoko Mori 对本项目的支持。

(C) 产业—大学—政府互动、(D) 产业组织、(E) 创业文化和(F) 商业基础设施构成了成功的创新型经济的基础。在第4部分，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日本，并简要回顾了日本在向硅谷等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日本缺乏支持硅谷产业生态系统的六个制度基础中的大多数。因此，至少在理论上，政府也可以鼓励在日本发展这些制度基础或具有同样功能的替代性制度。然而，有些制度在日本的发展，即使并非不可能，也需要很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利用硅谷已经存在的制度可能更有希望。日本政府已经多次尝试刺激日本创新型经济增长。第5部分评述了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旨在鼓励创新的主要产业政策措施。创新政策再次成为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的核心，也被称为“第三支箭”。第6部分简要介绍了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中包含的创新政策。第7部分回顾了以往日本企业直接从硅谷的制度中受益的经验。第8部分总结指出，日本政府已经尝试为鼓励创新推行了许多政策措施。因此，缺乏政策理念似乎并不是政府的问题。日本政府可以更多地协助日本企业和企业家直接进入硅谷的产业生态系统，但过去许多政府干预措施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政策效果评估，以及未能基于评估结果调整政策。

1. 创新对日本增长的重要性

创新对一个成熟经济体的增长至关重要。这是由索洛建立的简单而广泛使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揭示的。该模型假设总生产函数以下列方式将投入（劳动和资本）与产出（增加值）相联系：

$$Y = AF(K, L) \quad (1)$$

Y 是产出量（如GDP）的度量， K 是生产中使用的资本量， L 是劳动量。假设函数 $F(\cdot)$ 满足某些条件包括规模报酬不变和边际产出递减。 A 代表技术状态（也称全要素生产率或简称为TFP）。当 A 增加时，即使投入量保持不变，产出量也会增加。 A 的增加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被解释为技术进步或创新。

在 $F(\cdot)$ 的标准假设下，可以将等式（1）改写为每个劳动力的产出 (Y/L) 与资本深化 (K/L) 相联系的形式：

$$y = Af(k) \quad (2)$$

其中 $y = Y/L$, $k = K/L$ 。在标准假设下，可以再次将每个劳动力的产出增长分解为两个部分：

$$\% \Delta y = \% \Delta A + f'(k) \% \Delta k \quad (3)$$

等式右边第一项是百分比形式的技术水平增长率，即技术进步或创新。第二项是每个劳动力的资本增长率乘以资本的边际产出，被认为是资本深化对每个劳动力产出增长的贡献。

由于在标准假设下资本的边际产出随着资本的增长而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增长，公式（3）的第二项会变小。因此，随着经济的增长，创新成为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来源。

日本战后的经验与标准增长理论非常吻合。图1显示了日本、英国和美国的人均实际GDP变化的长期比较（1990年GK国际元，对数值）。1870年，江户时代结束后不久，日本对西方开放，日本的人均GDP仅为当时世界上最先国家英国的23%。在“富国强军”的口号下，明治政府开展社会经济现代化建设，引进西方技术、制度和组织。在“二战”前时期日本稳步赶上西方国家，但“二战”大大扭转了这一进程。战后日本的追赶进程重新开始，且明显加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进入大规模出口市场和日元低估对此也有所帮助。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赶上了更多的发达经济体。图1显示，日本的人均GDP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人均GDP水平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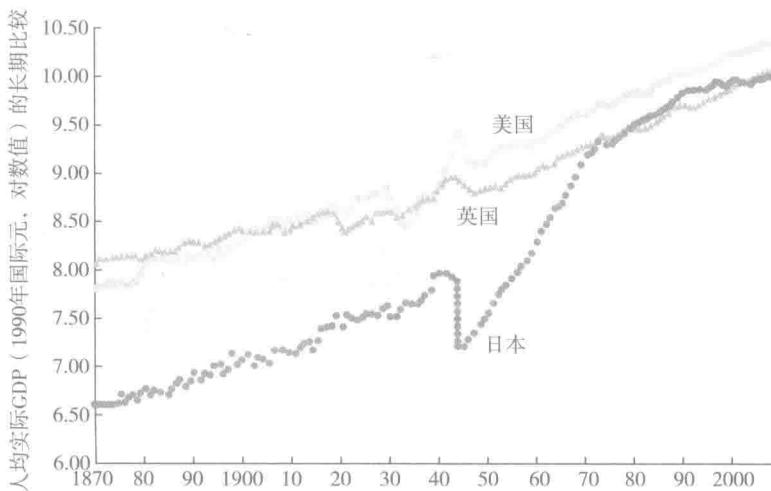


图1 人均实际GDP的长期比较：日本、英国和美国

资料来源：The Maddison-Project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2013 vetsppm)。

日本追赶上更多发达经济体后，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根据公式（3），我们

可以将每一劳动投入的实际 GDP 增长分解为资本深化的贡献和创新的贡献，图 2 给出了 20 世纪 70 年代至 21 世纪头 10 年的每 10 年中这两方面的贡献情况。数据来源于日本产业生产率数据库 2013 年版 (*JIP Database 2013*)。我们可以看到，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一直是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经济增长的源泉。技术进步的贡献甚至可能被低估了，因为一些新技术体现在资本中。我们也看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急剧下降，主要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生产率在 20 世纪头 10 年有所回升，但与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相比仍然低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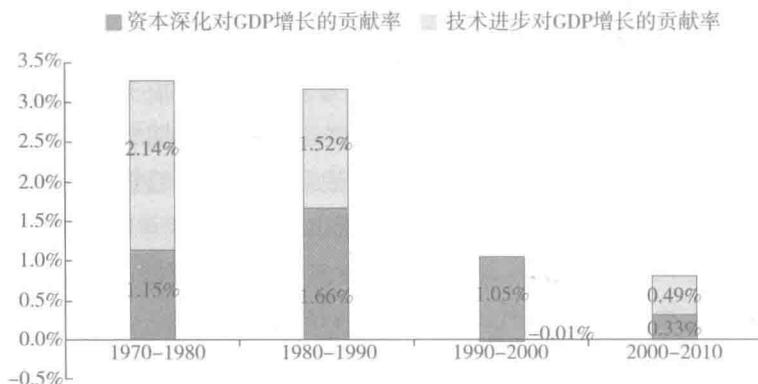


图 2 日本增长核算：1970—2010 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JIP Database 2013* (*Growth Accounting*) 的数据计算（数据从 <http://www.rieti.go.jp/en/database/JIP2013/#04-4> 下载，访问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21 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日本科技进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等更先进经济体的技术引进。日本应该鼓励更多的本土技术进步，但改变适应追赶型增长的经济体制很困难。正如星岳雄和卡什亚普 (Hoshi and Kashyap, 2011) 指出的，日本过去 20 年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没有将经济体制转变为支持创新型经济增长的体制。

总体技术进步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可以由现有生产单位的生产率增长（被称为效应）来解释，另一部分来自生产单位随时间的变化。后者进一步分解为由生产率较高的生产单位增长和生产率较低的生产单位缩减引起的再配置效应，以及由生产率较高的生产单位进入和生产率较低的生产单位退出引起的净进入效应。

经济学近来的研究表明，重新配置、进入和退出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对发达经济体非常重要。例如，福斯特等人 (Foster、Haltiwanger 和 Krizan, 2001)

发现，再配置和净进入效应解释了1977—1987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约一半的增长。仅净进入效应就解释了约25%—30%的生产率增长。对非制造业而言，净进入效应的重要性似乎更大。福斯特等人（2006）发现，1987—1997年美国零售业几乎所有的生产率增长都可由净进入效应来解释。

净进入效应的重要性意味着发达经济体的技术进步是通过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发生的，技术更先进的新生产单位替代了较落后的旧生产单位。为了恢复经济增长，日本需要转变其经济制度，鼓励这种创造性破坏。那么，应该怎么做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研究依靠不断创造新理念、新业务和新企业实现增长的硅谷。

2. 认识硅谷的生态系统

硅谷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创新型经济体系之一（Lee and Miller et al., 2000）。硅谷有各种商业组织和机构，创造了一个商业环境，事实证明，这个环境非常有利于成功建立创业公司、破坏性商业模式，以及各种高科技领域的领导力。“让系统有效运作”的硅谷各个组成部分和特点相互融合与补充，被称为硅谷的“生态系统”。^①

硅谷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它们如何发挥作用，又如何组合在一起？在本部分中，我们将利用关于硅谷的已有研究，介绍硅谷的生态系统。

2.1 硅谷在哪里？硅谷生态系统的地理分布

硅谷没有出现在地图上。硅谷这个词涉及非正式的一连串城市和县，这些城市和县分享了该地区生态系统的特征。在收集数据时，“硅谷”标签中要包括哪些区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所谓的“硅谷政府”，硅谷只是一些县的集合。直到最近，硅谷一般指圣克拉拉谷地区，从门洛帕克延伸到圣荷塞。大多数描述硅谷的分析排除了旧金山市和东湾（伯克利、奥克兰等旧金山湾以东的地区）（见图3）。

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硅谷已经发展到包括旧金山湾区的绝大部分。诸如Genentech和生物技术集群位于南旧金山，而诸如Salesforce.com和Twitter（推特）等创业公司位于旧金山。员工的流动意味着强劲的旧金山创业生态系

^① 它也被称为“栖息地”，我们更喜欢“生态系统”，因为“商业生态系统”现在是商业写作中更常见的用语。



图3 更广泛的硅谷经济生态系统

资料来源：谷歌地图，作者进行了编辑。

统分享了许多这些传统上被认为属于硅谷的金融、人力资源和创意流。此外，伯克利加州大学是硅谷生态系统的一个关键贡献者，但它位于旧金山以东。

因此，硅谷在地理区域上从未得到明确界定。在本报告中，我们把硅谷的生态系统视为全球人力资源、金融和创意流的中心，推动了旧金山湾区的城市及其周边近邻地区的创新型经济增长。

图3显示了更广泛的硅谷经济生态系统。原来的硅谷生态系统被认为是图3中下方的椭圆形区域。旧金山一开始是独立发展的，直到它呈现出许多硅谷产业生态系统的特征，如图左上方的椭圆形区域。我们认为更广泛的地理区域是更广泛的硅谷经济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大致是虚线所围绕的区域。

2.2 定义硅谷生态系统的特征

本节其余部分识别了我们认为必不可少的硅谷的11项特征。表1列出了

这些定义性特征。所有这些作为其成功的独特贡献，都被许多与硅谷相关的研究引用（例如，Lee et al.，2000）。这些因素如表1所示。

表1 硅谷生态系统的11个关键特征

-
- 1. 大型企业和快速增长的小型创业公司组成的双重生态系统
 - 2. 竞争激烈的行业，“开放式创新”与商业秘密保护之间的平衡
 - 3. 成功的企业家和初创企业的早期雇员可获得较高的财务回报
 - 4. 风险投资为创业企业提供资金和公司治理支持
 - 5. 为各个阶段的创业公司提供高水平和多样化的人力资源
 - 6. 劳动力流动性高
 - 7. 顶尖大学
 - 8. 政府在塑造技术方向和基础科学方面的广泛作用
 - 9. 商业基础设施（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创业导师等）
 - 10. 接受失败
 - 11. 法律平台
-

2.2.1 大型企业和快速增长的小型创业公司组成的双重生态系统

首先，硅谷有一个大型企业和初创公司共存的商业生态系统。硅谷有时被认为是初创公司的“麦加”，但从很多方面来说，它是创业公司和大型企业共存的生态系统，大型企业可以为创业公司提供市场、人力资本甚至专业知识，使生态系统有效运行。大型企业并购初创企业，可以给硅谷生态系统带来资本、人力资源和知识，有利于未来的创业和投资。此外，一些初创公司最终成长为大型企业，一些员工辞职后创业又产生新的公司，推动了良性循环。

大型企业经常是初创企业的第一批客户，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包括已有相当长历史的传统大公司，如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洛克希德和惠普，以及相对较近时期成为大型企业的苹果、甲骨文（Oracle）、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等。

大型企业也通过并购活动获得初创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大型企业可以提供资源，使被并购创业公司的创意获得比初创企业可能实现的更大和/或更快的市场成功。

传统上，大型公司担任创业公司产品和服务的主要买家。这使初创公司在提供能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B2C”）之外，在面向企业（“B2B”）的